

“流求”指向演变所见古代中国 东海疆域的形成*

陈 刚

摘 要:《隋书》以“流求”之名所建构的东海岛屿形象,实际是唐初将隋代性质不同、航向不一、目的地迥异的多次海外探索事迹拼合而成,故其具体指向并不清晰。唐至两宋,官方、士人、海商、海民等不同阶层共同参与东海开发,海上航路不断拓展,沿海不同地区生成了各自的“流求”意象。在这一过程中,“流求”指涉地域由虚趋实,逐渐指向台湾岛。元明时期,中国官方根据东海形势变化,强化对台湾岛和琉球群岛的经略,先后实现对台湾岛的行政管辖和对琉球海域的常态管控,“流求”也在官方主导下统一指向今琉球群岛。

关键词: 海疆 东海 钓鱼岛 台湾岛 琉球群岛

“流求”之名最早见于《隋书》,是古代中国指涉东海岛屿的重要名称。明初,其位置被中国官方正式确定为琉球群岛。^① 明清时期,时人多将明以前史籍所记“流求国”等同后世琉球王国,琉球在编修国史时亦将其作为追述王国前史的重要史料。^② 近代以后,学界对明清时期“明以前流求国即是明以后琉球王国”的认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战后日本历史进程与国际影响力研究”(22VLS014)、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琉关系通史”(16ZDA128)、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琉球通史”(21BSS008)阶段性成果。

① “流求”在东亚古代典籍中有多种写法,《隋书》记作“流求”,其他文献有琉求、流球、流虬、留仇、瑠球、瑠求等多种写法,大体音同形异。本文在引用史料时,保留史料原有写法,在一般论述时使用明代以后惯用的“琉球”写法。

② 如成书于1650年的琉球国史《中山世鉴》便将“琉球”之名缘起,追述到《隋书》所记最早到达“流求”的朱宽身上,1725年成书的《中山世谱》继承并发展这一观点。〔中山世鑑〕、横山重ほか編:『琉球史料叢書』、東京:東京美術、1972年、第5卷、第8頁;〔中山世譜〕、横山重ほか編:『琉球史料叢書』第4卷、第23頁。

知提出疑问,各方学者从历史学、地理学、民俗学、语言学、人类学等不同角度,对明以前“流求”具体位置进行考证研究,并围绕“中国台湾说”和“琉球说”两大观点展开长期论争。^①

这一论争迄今已延续百余年,却难有共识,主要原因在于相关研究缺乏对“流求”指涉区域变迁的动态把握。由于明以前“流求”记录相对零散,难以形成逻辑严密的互证关系,既往研究多集中于对《隋书·流求传》等特定篇目考证,缺乏对隋明之间700余年史料变化情况的系统研究。在具体考证中,由于立场和方法不同,学者对同一史料解读往往迥然相异。^②

鉴于此,本文尝试从知识社会史和海洋发展史角度,对明以前“流求”记录进行长时段系统研究。在更广泛搜集明以前“流求”文献基础上,梳理文献生成、发展、演变的历史语境、社会背景和知识谱系,继而厘清古代中国对东海探索、经营、开发、管治的历史演进过程,考察古代中国东海疆域形成的历史轨迹。

一、隋代“流求”指向的模糊性

古代中国东海认知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历史过程。^③上古时期,《尚书》《尔雅》《庄子》等经典著作中有关渤海之东的大壑、仙山等记述,反映了古代中国对东海的初步认知。秦汉时期,史书中有关“东鯤”、“夷洲”、“亶洲”等记载,表明先民的东海交往空间逐步扩大。三国时期,东吴黄龙二年(230)卫温、诸葛直率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亶洲,是中国官方对台湾岛等东海岛屿的重要探索,吴人沈莹在《临海水土志》中留下了关于台湾最早的记述。^④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朝政权

- ① 有关《隋书》等明以前史籍记载中“流求”位置的考证,最早于19世纪70年代在西方汉学家中展开,这些学者普遍认为明以前中国史籍所记“流求”是指中国台湾,而非后世琉球王国。日本学界之后也开始讨论此问题,并形成“中国台湾说”和“琉球说”两大观点。二战前,欧美学界和日本学界关于“流求”位置考证讨论已被国内学者所关注,“中国台湾说”逐渐为国内学者所接受。二战后,国内掀起琉球研究热潮,“琉球说”又成主流观点。20世纪50年代后,梁嘉彬、陈汉光、吴幅员、宋岑、林鹤亭、方豪、周维衍、陈国强、米庆余、张崇根、徐晓望、周运中等学者都先后对此问题进行专门讨论,但始终未达成共识。
- ② 如对《隋书·流求传》中“当建安郡东,水行五日而至”(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823页)等“流求”位置记录解读,国内外学界已有10种以上观点。市村瓚次郎、藤田丰八、和田清、伊波普猷、币原坦、松本雅明、梁嘉彬、米庆余、徐晓望、周运中等学者都曾试图通过解读这一记录推定“流求”位置,但彼此观点大相径庭,具体研究方法比史料本身更为复杂。
- ③ 李国强:《关于海疆史研究的几点认识》,《史学集刊》2014年第1期。
- ④ 参见张海鹏、陶文钊主编:《台湾史稿》,南京:凤凰出版社,2012年,第4—5页;陈支平主编,宋光宇等著:《台湾通史》第1卷《上古至明代》,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122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台湾问题与新时代中国统一事业》(台湾问题白皮书),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3页。

积极经略海外，对外交流呈现“四海流通，万国交会”、“舟舶继路，商使交属”的活跃景象，航海技术、造船业和海外认知都有较大进步。^①

（一）隋代海外探索与《隋书》“流求”叙事生成

隋统一后，沿海地区长期积累的航海经验为这一时期海外探索奠定了基础。炀帝即位后，广募天下能士，“开远夷，通绝域”，四出交通，广开疆土。^②大业三年（607），遣朱宽等人入海求访异俗，后又遣陈稜、张镇州等跨海远征异域。唐初修《隋书》，将朱宽、陈稜、张镇州等人的海洋探索事迹编入《流求传》，“流求”之名首次出现在中国正史中。^③

对朱宽等人的海外探索，《隋书·流求传》记述如下：

大业元年，海师何蛮等，每春秋二时，天清风静，东望依希，似有烟雾之气，亦不知几千里。三年，炀帝令羽骑尉朱宽入海求访异俗，何蛮言之，遂与蛮俱往，因到流求国。言语不通，掠一人而返。明年，帝复令宽慰抚之，流求不从，宽取其布甲而还。时倭国使来朝，见之曰：“此夷邪久国人所用也。”帝遣武贲郎将陈稜、朝请大夫张镇州率兵自义安浮海击之。至高华屿，又东行二日至鼉鼈屿，又一日便至流求。初，稜将南方诸国人从军，有昆仑人颇解其语，遣人慰谕之，流求不从，拒逆官军。稜击走之，进至其都，频战皆败，焚其宫室，虏其男女数千人，载军实而还。自尔遂绝。^④

在《隋书·流求传》记述中，朱宽等人海外探索共有3次，所到之地均被记为“流求”，相互之间构成隋朝对“流求”从发现到求访、从求访到慰抚、再由慰抚不成到伐灭其国的内在关联性。近代以来，学界对《隋书》所记“流求”究竟是

① 《宋书》卷97《夷蛮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380、2399页。

② 隋炀帝即位后，除增设四方馆加强同周边邻国交往以外，还广募能通绝域人才，派遣多路使者四出交通，如遣韦节及杜行满出使西蕃诸国、裴矩经营西域、李昱通使波斯、常骏出使赤土、裴世清出访倭国等，极大巩固和扩展古代中国对外交往空间，丰富古代中国对域外世界认知。参见王小甫等编：《古代中外文化交流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40—141页。

③ “张镇州”在《隋书·陈稜传》中写作“张镇周”。《隋书》有关“流求”的记事主要见《流求传》和《陈稜传》两篇列传（卷81《流求传》，第1823—1825页；卷64《陈稜传》，第1518—1520页）。《流求传》主要记述“流求”地理位置、社会组织、人种风俗、物产气候及隋通“流求”基本经过，包括朱宽两次求访、慰抚和陈稜一次征伐。《陈稜传》较详细记载大业六年陈稜跨海远征“流求”具体航路及征战过程，是《流求传》重要补充。在《隋书》整体构成中，有关外国异域记录被按方位分别编入《东夷传》《南蛮传》《西域传》《北狄传》，《流求传》在《东夷传》，同传共记有6地，其他5地为高丽、百济、新罗、靺鞨、倭国。

④ 《隋书》卷81《流求传》，第1824—1825页。

“台湾岛”还是“琉球群岛”的考证与论争，亦是在《隋书·流求传》的叙事建构下展开。

(二)《隋书》“流求”叙事并不完全符合史实

《隋书·流求传》的叙事建构虽然主线清晰，却并不完全符合史实，从唐初史籍中2条未被《隋书·流求传》收录的“流求”记事即可看出。

第1条见《隋书·食货志》：

是岁，翟雉尾一，直十缣，白鹭鲜半之。乃使屯田主事常骏使赤土国，致罗刹。又使朝请大夫张镇州击流求，俘虏数万。士卒深入，蒙犯瘴疠，馁疾而死者十八九。又以西域多诸宝物，令裴矩往张掖，监诸商胡互市。啖之以利，劝令入朝。^①

这段史料在《隋书·食货志》炀帝大业元年即位条后、大业三年条前，引文中“是岁”应为大业二年。该段所述炀帝令“常骏使赤土国”、“裴矩往张掖”，在《隋书·赤土传》《隋书·裴矩传》《隋书·西域传》中皆有详载，常骏、裴矩到达“赤土”、“张掖”时间均为大业三年，与引文所记时间顺序契合。^②故文中炀帝“使朝请大夫张镇州击流求”，亦应发生于大业二年至三年间。

第2条见《大业杂记》：

(大业七年)十二月，朱宽征流仇国还，获男女口千余人并杂物产，与中国多不同。緝木皮为布，甚细白，幅阔三尺二寸。亦有细斑布，幅阔一尺许。^③

该记事《朝野僉载》亦有收录。^④《朝野僉载》前半部分与《大业杂记》相同，后半部分为《大业杂记》所不存，具体为：

又得金荆榴数十斤，木色如真金，密致而文彩盘蹙，有如美锦。甚香

① 《隋书》卷24《食货志》，第686—687页。《隋书·食货志》是《隋书》的重要组成部分，完成时间比《隋书·流求传》晚20年，主持编修的官员也由魏征变为长孙无忌。

② 《隋书》卷82《南蛮传·赤土》，第1834页；卷67《裴矩传》，第1580页；卷83《西域传·序》，第1841页。

③ 杜宝撰，辛德勇辑校：《大业杂记辑校》，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41—42页。杜宝在隋炀帝时期担任秘书学士，曾参与编修全国地理总图志《区宇图志》，并著有《水饰图经》，入唐以后任著作郎。他在《隋书》刊行后自撰《大业杂记》，专录隋炀帝大业年间史事，该书序言自谓作此书初衷，正是有感“贞观修史，未尽实录，故为此书，以弥缝阙漏”。参见牟发松：《关于杜宝〈大业杂记〉的几个问题》，《汉唐历史变迁中的社会与国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316—323页；辛德勇：《〈大业杂记〉考说》，《古代交通与地理文献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261—270页。

④ 《朝野僉载》是唐代士人张鷟所著，主要记载隋唐二朝人物事迹、典章制度、社会风尚、传闻逸事等。该书大体成于开元年间，是当时人记当时事，所记之事具有较高史料价值，被后世史家广为引用。这段“流求”记事在《太平广记》等史书中亦有引录。

极精，可以为枕及案面，虽沉檀不能及。彼土无铁，朱宽还至南海郡，留仇中男夫壮者，多加以铁钳锁，恐其道逃叛。还至江都，将见，为解脱之，皆手把钳，叩头惜脱，甚于中土贵金。人形短小，似昆仑。^①

据此可知，隋大业年间朱宽也曾征伐过“流（留）仇国”，出征时间史无详载，返回时间为“（大业）七年十二月”。

综合相关史料可知，隋代朱宽等人海外探索共有5次：大业二年至三年间，张镇州“击流求”；大业三年，朱宽求访“流求”；大业四年，朱宽慰抚“流求”；大业六年，陈稜、张镇州征伐“流求”；大业七年，朱宽征“流仇”。相互比对，不难发现这些海外探索具有不同面貌。

如《隋书·食货志》载张镇州击“流求”和《隋书·流求传》载朱宽求访“流求”，时间虽皆为大业三年前，但从动机看，前者是军事征伐，后者是求访异俗；从结果看，前者“俘虏数万”，后者“掠一人而返”，两者相差甚远。又如《隋书·流求传》在大业六年陈稜、张镇州几乎伐灭“流求”后，写道“（流求）自尔遂绝”，但《大业杂记》等又记有大业七年朱宽再次征伐“流仇”事，彼此之间相互矛盾。

可见，隋代朱宽等人海外探索并不必然具有《隋书·流求传》所建构的内在关联性。这些海外探索在时间上可能同时，在性质上则相互独立，所到之地并不必然相同。唐初修《隋书》时，并未保留隋代海外探索的原本面貌，而是通过史料裁剪，重新建构了隋朝同“流求”交往的历史叙事。^②

（三）《隋书》“流求”具体指向并不清晰

《隋书》的叙事建构使其所记“流求”具体指向并不清晰，体现在其对“流求”

① 张鷟：《朝野僉载》，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69—170页。

② 需指出的是，唐初修《隋书》时，虽距隋朝灭亡不久，但可资利用的有关隋大业年间史料却相对有限。大业年间隋炀帝所聚大量书籍因隋末战乱“皆湮灭与煨烬”，唐平定王世充后所得隋朝旧藏图书，在运往京师途中漂没于河。《隋书·经籍志》称“其所存者十不一二”（第908页），《新唐书·艺文志》则称“尽亡其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422页）。唐武德四年（621）令狐德棻向唐高祖建言修前代史时称“窃见近代已来，多无正史，梁、陈及齐，犹有文籍，至周、隋遭大业离乱，多有遗阙。当今耳目犹接，尚有可凭，如更十数年后，恐事迹湮没”（《旧唐书》卷73《令狐德棻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597页）。同年，李世民命“房玄龄先入中书、门下省，收隋图籍制诏”，但结果却“已为世充所毁，无所获”（《资治通鉴》卷189，唐高祖武德四年五月丁卯，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5916页）。《隋书》修撰期间，唐太宗曾问魏征隋史修撰情况，魏征对曰：“隋家旧史，遗落甚多，比起撰录，皆是采访。”（王方庆集：《魏郑公谏录》卷4《对隋大业起居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8—39页）《隋书·南蛮传》指出：“大业中，南荒朝贡者十余国，其事迹多湮灭而无闻。今所存录，四国而已。”（第1831页）可见，史料局限影响唐修隋史完整性。

位置和形象的记述中。

《隋书·流求传》对“流求”位置记述有二处：一是“当建安郡东，水行五日而至”；二是“自义安浮海击之，至高华屿，又东行二日至鼉鼉屿，又一日便至流求”。后者为大业六年陈稜远征时航路，《隋书·流求传》虽未载明总日程，但《隋书·陈稜传》却明记为：“自义安泛海，击流求国，月余而至。”^①

可见《隋书》对“流求”位置描述至少来源于2种不同的海洋经验，分别是自建安（今福建福州）出海水行五日而至；自义安（今广东潮州）泛海，经高华屿、鼉鼉屿，月余而至。2条航路的到达地虽都被记为“流求”，但出发地和航行时间存在较大差异，所到之地应区分考察。^②

在记述“流求”形象时，《隋书》虽将“流求”列为“东夷”，但描述多与“南蛮”相类。如《隋书·流求传》记其地“土多山洞”，国王所居曰“波罗檀洞”；“国有四五帅，统诸洞，洞有小王”、“国人好相攻讨”。《隋书·南蛮传》开篇便称“南蛮杂类……随山洞而居……其俗断发文身，好相攻讨”。^③ 以往学者考证时多将《隋书·流求传》所记“洞”、“山洞”等同于现代语意的“山洞”、“溶洞”，但六朝隋唐文献中“洞”、“山洞”主要指南方山区普遍存在的山间盆地或河谷地带。从这点看，作为东夷的“流求”又杂糅了南蛮的形象。^④

《隋书·食货志》又载张镇州征“流求”，因“士卒深入，蒙犯瘴疠”，以至“馁疾而死者十八九”。据《隋书·地理志》“自岭已南二十余郡，大率土地下湿，皆多瘴疠，人尤夭折”，^⑤ 可知隋唐时期，瘴疠发生区域主要在岭南及其以南地区。^⑥ 故此“流求”可能在岭南或其以南地区。

① 《隋书》卷81《流求传》，第1823—1825页；卷64《陈稜传》，第1518—1520页。

② 后世学者在考证“流求”位置时不仅未对两种不同的航海经验区分考察，还往往将两类位置记载混同，形成“自建安（或义安）浮海，二日至高华屿，又东行二日至鼉鼉屿，又一日至流求，共五日而至”新表述，并以此考证“高华屿”、“鼉鼉屿”和“流求”位置。如市村瓚次郎便据此把“水行五日”出发点定为义安（今广东潮州），将“高华屿”推定为“潮州附近的岛屿”，将“鼉鼉屿”推定为“澎湖列岛”，将“流求国”推定为台湾岛（「唐以前の福建及び台湾に就いて」、『東洋学報』第8卷第1号、1918年、第1—25页）。米庆余据此将“水行五日”起点定为建安（今福建福州），并结合后代琉球国册封使航海经验，将“高华屿”推定为“钓鱼岛附近的岛屿”，将“鼉鼉屿”判定为“久米岛”，将“流求国”推定为琉球本岛（《〈隋书·流求传〉辨析》，《历史研究》1995年第6期）。此类考证方法因缺乏史料辨析，结论并不牢固。

③ 《隋书》卷81《流求传》，第1823页；卷82《南蛮传·序》，第1831页。

④ 王承文：《论唐代岭南“溪洞”和“山洞”的开发》，《人文杂志》2018年第5期。

⑤ 《隋书》卷24《食货志》，第686—687页；卷31《地理志下》，第887页。

⑥ 左鹏：《汉唐时期的瘴与瘴意象》，于薇等主编：《南岭历史地理研究》第2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57页；《宋元时期的瘴疾与文化变迁》，《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

再如,《隋书·流求传》记陈稜远征“流求”时,曾“将南方诸国人从军,有昆仑人颇解其语”。隋唐时期,“南方诸国”、“昆仑”多指向东南亚等“南蛮”地区。如《南齐书》谓林邑国“人色以黑为美,南方诸国皆然”,^①“林邑”位于今越南中南部。《旧唐书》称“自林邑以南,皆卷发黑身,通号为‘昆仑’”。^②“昆仑”泛指东南亚、南亚等地肤色较深的航海贸易者。^③可知陈稜所征之地或已拓展至与“昆仑”、“林邑”相近的“南蛮”地区。故《隋书》虽将征“流求”事编入《东夷传》,但对该事评述却编入《南蛮传》,与“兵加林邑”并列为炀帝“威振殊俗”之举。^④

通过上述考辨不难得知,《隋书》虽试图通过《流求传》建构一个位于东海的岛屿形象,但其具体叙事拼合了隋代多次性质不同、航向不一、目的地迥异的海外探索事迹,所记“流求”的具体指向并不清晰。后世学者据此想对其所记“流求”位置进行考证,在方法论上并不可行。

从海洋发展史看,隋代朱宽、陈稜、张镇州等人的海外求访、招抚、慰谕、征伐活动,不仅是中国官方对东海等环中国海岛屿的一次全方位探索,也是中国尝试收附台湾岛等东海岛屿的重要史证。《隋书》刊布后,“流求”成为中国指涉东海岛屿的最重要名称,对后世东海认知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唐宋时期“流求”指向由虚趋实

唐宋时期是中国海上交通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经广州、明州(今宁波)、泉州、福州等地出海,通往东非、西亚、南亚、东南亚、日本、琉球群岛等地航路全面发展。在此过程中,“流求”意象广为流传,指涉区域不断扩大,一方面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另一方面逐渐由虚趋实,开始具体指向台湾岛。“流求”指向的演变过程,体现了唐宋时期我国多主体、全方位、跨区域经营、开发、管辖东海列岛的历史进程。

(一) 岭南:“流求”指向海外贸易国

岭南地区自秦汉以来便是中国交通海外的重要地域。唐代“广州通海夷道”已延伸至波斯湾及非洲东海岸,连通中华、东南亚、阿拉伯三大海洋文明。^⑤广州成

① 《南齐书》卷58《东南夷传》,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1014页。

② 《旧唐书》卷197《南蛮传·林邑》,第5270页。

③ 罗德里希·普塔克:《海上丝绸之路》,史敏岳译,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9年,第65页。

④ 《隋书》卷82《南蛮传·史臣曰》,第1838页。

⑤ 杨国楨:《中华海洋文明的时代划分》,李庆新主编:《海洋史研究》第5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8页。

为中国当时最大的对外贸易港，唐王朝开始在广州设市舶使专门管理外国商船的来华贸易。^①

早在唐初，史官在记述隋代海外探索时，便已注意到“流求”同岭南的关联。如《隋书·陈稜传》《隋书·流求传》载大业六年陈稜征“流求国”时，出发港口为义安，军中有“昆仑人”，到达后“流求人……以为商旅，往往诣军中贸易”。^②《大业杂记》《朝野僉载》载大业七年朱宽征“留仇国”时返还港口为“南海郡”（今广东广州），所获“留仇人”，“人形短小，似昆仑”。^③

唐中后期，士大夫阶层多将“流求”视为岭南地区的海外贸易国。如元和八年（813），时任永州司马柳宗元应岭南节度使马总之邀作《岭南节度飨军堂记》，称岭南海外多蛮夷，“由流求、诃陵，西抵大夏、康居，环水而国以百数，则统于押藩舶使焉”。^④长庆三年（823），郑权以工部尚书为岭南节度使，韩愈送别郑权的序文同样称岭南“海外杂国，若耽浮罗、流求、毛人、夷亶之洲，林邑、扶南、真腊、于陀利之属，东南际天地以万数，或时候风潮朝贡，蛮胡贾人舶交海中”。^⑤昭宗时期，曾任广州司马的刘恂在《岭表录异》中，以“其国人么麽，一概皆服麻布而有礼。竟将食物求易钉铁”，记述“流虬”有礼及喜好贸易的形象。^⑥直至宋元时期，以“流求”指代岭南之外的海外贸易国认知仍在士人间流传。^⑦

（二）明州：“流求”指向中日航路途经地

唐代浙江地区的海外交通得到极大拓展，自明州出洋、经东海、抵达日本九州北部的航路为唐代海商所开辟。^⑧天宝以后，该航路成为日本遣唐使来华的主要路

① 李庆新：《海上丝绸之路》，合肥：黄山书社，2016年，第67—85页。

② 《隋书》卷64《陈稜传》，第1519页；卷81《流求传》，第1824—1825页。

③ 杜宝撰，辛德勇辑校：《大业杂记辑校》，第42页；张鷟：《朝野僉载》，第169—170页。

④ 《柳宗元集》卷26《岭南节度飨军堂记》，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706—707页。

⑤ 韩愈撰，马其昶校注：《韩昌黎文集校注》卷4《送郑尚书序》，马茂元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283—284页。

⑥ 刘恂撰，商璧、潘博校补：《岭表录异校补》卷上《六国》，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88年，第80页。

⑦ 如楼钥《送万耕道帅琼管》中有记“琉球大食更天表，舶交海上俱朝宗。势须至此少休息，乘风径集番禺东”（《攻媿集》卷3，王云五主编：《丛书集成初编》，北京：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46—47页），元朝末年杨翮《送王庭训赴惠州照磨序》亦记有“世传岭南诸郡近南海，海外真腊、占城、流求诸国，蕃舶岁至，象犀、珠玑、金贝、名香、宝布，诸凡瑰奇珍异之物，宝于中州者，咸萃于是”（《佩玉斋类稿》卷4，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220册，第84页），皆将“流求”视为来广州朝贡贸易之国。

⑧ 傅璇琮主编，张如安等著：《宁波通史·史前至唐五代卷》，宁波：宁波出版社，2009年，第203—210页。

线，明州也成为中国通往日本等国的重要口岸。^①

根据明州等地方志记载，唐中期开始，陈稜跨海征“流求”的事迹已在当地流传。两宋时期，陈稜远征“流求”时曾途经舟山群岛的认知逐渐形成，“流求”被当地人用以指涉自舟山出海后的所经之地。^②南宋咸淳年间，编绘于明州的《輿地图（墨线图）》即体现出这一认知，图中明州岸外的海岛、港口、航线被详细列明，陈稜祀庙所在“胸山”、“代山”被明确标出，“流求”则被标注在岛群东侧，与“代山”相对。^③两宋时期浙东地区的航海记录、方志文献、诗文词赋中有不少记载体现了当地“海以外是流求国”的认知。^④可见至晚在两宋时期，自明州等地出海远航，途经之地为“流求”已成为浙东地区的普遍认知。

随着中日交往增多，“流求”意象也传至日本，被入华日本僧侣用以指代其航海飘风所到之地。如贞元二十年（804），空海在追述自己渡航中国经历时，以“凯风朝扇，催肝耽罗之狼心；北风夕发，失胆留求之虎性”表达对飘风所到之地的恐怖想象。^⑤大中七年（853），圆珍搭乘唐代商人钦良晖的商船前往浙江天台山国清寺、越州开元寺求法，大中十二年学成后返回日本。在回国所作奏状中，圆珍同样以“十四日辰头，漂到彼山脚，所谓琉球国，吃人之地”追述自己渡唐时的飘风经历。^⑥此后，“流求国”为海中“吃人之地”形象，经过《元亨释书》《今昔物语集》等著述不断演绎，在日本广为流传。^⑦南宋淳祐年间，庆政更以《漂到流球国记》为题，详细记录日本宽元元年（1243）渡宋僧等人航海遭风漂至“流球国”见

① 魏志江、郑洁西：《8至14世纪中日海域航路考》，《社会科学战线》2017年第5期。

② 《唐程夫人墓志铭并序》，岱山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岱山县志》，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671页；罗濬：《宝庆四明志》卷20《昌国县志·叙祠·神庙》，《宋元浙江方志集成》，杭州：杭州出版社，2009年，第8册，第3544页；冯福京：《大德昌国州图志》，《宋元浙江方志集成》第10册，第4761页。

③ 曹婉如等编：《中国古代地图集（战国—元）》图83《輿地图（墨线图）》，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图版说明第6—7页；朱鉴秋等编著：《中外交通古地图集》，上海：中西书局，2017年，第44页。

④ 《太平寰宇记》，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976、1985页；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7页；胡融：《望海石》，林表民编：《天台续集别编》卷4，《宋元浙江方志集成》第14册，第6893页。

⑤ 空海：『性灵集』卷5「为大使与福州观察使书一首」、祖風宣揚会編：『弘法大師全集』卷10、東京：吉川弘文館、1910年、第71頁。

⑥ 竹内理三編：『平安遺文』卷9「圓珍奏状」、東京：東京堂出版、1957年、第3429頁。

⑦ 参见虎関師鍊：『元亨釋書』卷3「釋圓珍」、黑板勝美編：『新訂增補国史大系』、東京：吉川弘文館、2000年、第31卷、第68頁；尊通：「智證大師年譜一卷」、『智証大師全集』、東京：園城寺事務所、1919年、第1381—1396頁；《今昔物語集》，金伟、吴彦译，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06年，第2册，第467—471页。

闻,同样将“流球国”描述为食人肉骨野蛮恐怖之地。^①

对空海、圆珍、庆政等人所记“流求”的具体位置,后世学者多据其遭风漂流时的风向、日程等信息,将空海、圆珍漂流所到“流求”判定为台湾岛北部,将庆政所记“流球”判定为琉球群岛。^②

(三) 泉州:“流求”指向台湾岛南部

唐末五代,在闽国统治集团经营下,福建经济有了长足发展,泉州已成为东南沿海的重要港口。^③两宋时期,福建海商异军突起,海外贸易的规模和范围得到极大扩展。^④自泉州出海,经澎湖列岛、台湾岛南部到达今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地区的航路也逐渐发展成熟。^⑤在此过程中,泉州地方文献多以“流求”记录其对外海岛屿的认知。

如北宋初年张士逊任邵武知县时所编《闽中异事》,内称:“泉州东至大海一百三十里,自海岸乘舟,无狂风巨浪,二日至高华屿,屿上之民作鲞腊鲟鱈者千计。又二日至鼉鼉屿,鼉鼉形如玳瑁,又一日至流求国。其国别置馆于海隅,以待中华之客。”^⑥成书于嘉祐五年(1060)的《新唐书·地理志》“泉州清源郡”条中亦有“自州正东海行二日至高华屿,又二日至鼉鼉屿,又一日至流求国”记载。^⑦崇宁年间,李复在给友人的信中称“流求国,隋史书之不详,今近相传,所说如此,去泉州不甚远,必有海商往来”。^⑧作成于北宋末年的《历代地理指掌图·唐十道图》亦将“高华屿”、“鼉鼉屿”、“流求”依次标注在泉州海外。^⑨可见北宋时期,“流求”开始被认为位于泉州海外,有海商往来。^⑩

- ① 庆政:『漂到流球国記』。原件藏于日本宫内厅书陵部,相关研究参见山里純一:『古代日本と南島の交流』、東京:吉川弘文館、1999年。
- ② 山里純一:「漂到流球国記について」、『古代日本と南島の交流』、第203—229頁;周运中:《正说台湾古史》,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16頁。
- ③ 李庆新:《海上丝绸之路》,第126頁。
- ④ 廖大珂:《福建海外交通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61頁。
- ⑤ 杨国桢:《闽在海中:追寻福建海洋发展史》,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年,第65—66頁;吴春明:《涨海行舟:海洋遗产的考古与历史探索》,北京:海洋出版社,2016年,第109—122頁。
- ⑥ 李复:《滴水集》卷5《与乔叔彦通判》,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21册,第52—53頁。
- ⑦ 《新唐书》卷41《地理志五》,第1065頁。
- ⑧ 李复:《滴水集》卷5《与乔叔彦通判》,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21册,第52—53頁。
- ⑨ 曹婉如等编:《中国古代地图集(战国—元)》,图97《唐十道图》、图版说明第7頁。“鼉鼉屿”在《唐十道图》中被写为“鼉鼉屿”。
- ⑩ 北宋泉州的“流求”记录中“水行五日而至”及经“高华屿”、“鼉鼉屿”后至“流求”的记述与《隋书·流求传》相同,但出海之地“泉州”却与《隋书·流求传》所记“建安”、“义安”有异。这说明北宋时期,以泉州为中心的海外认知正在形成。

南宋时期，由于“人稠地瘠”，泉州人民不得不向海外发展，澎湖和台湾便成为理想开发之地。^①《闽书》引“宋志”称，“澎湖屿，在巨浸中，环岛三十六，人多侨寓其上，苦茅为舍，推年大者长之，不畜妻女，耕渔为业，雅宜放牧，魁然巨羊，散食山谷间，各髻耳为记。有争讼者，取决于晋江县”，^②表明至晚在南宋，泉州人民已大量寓居澎湖列岛，澎湖列岛已被纳入中国政府管辖范围，隶属泉州府晋江县。^③

与此同时，泉州地区对“流求”的认知发生较大转变。淳熙年间，郑藻所撰《乾淳纪事》开始以“泉州东有岛曰澎湖，烟火相望，水行五日可至（琉球）”、“琉球旁有毗舍耶国”记述“流求”位置，舍弃“高华屿”、“鼃鼃屿”等旧名，加入“平湖”、“毗舍耶”等新名，同泉州地方经验融合。^④但郑藻对“琉球”形象记述为“自唐以来，不通贡献，亦不为寇患”。^⑤

嘉定十一年（1218），真德秀任泉州知府期间记称，“乾道间，毗舍耶国入寇，杀害居民，遂置寨于此。其地阡临大海，直望东洋，一日一夜可至澎湖。澎湖之人，遇夜不敢举烟，以为流求国望见必来作过”，^⑥开始将“流求”与“毗舍耶”混同，视为海寇来源之地。宝庆元年（1225），泉州市舶司提举赵汝适所编《诸蕃志》称流求“无他奇货，尤好剽掠，故商贾不通”。^⑦《闽书》引“宋志”称澎湖之民：“入夜不敢举火，以为近琉球，恐其望烟而来作犯。”^⑧由是，“流求”形象逐渐从“海商往来之地”变为“尤好剽掠之国”。

① 方豪：《台湾早期史纲》，北京：海豚出版社，2016年，第45—46页。

② 何乔远：《闽书》卷7《方域志·澎湖屿》，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册，第179页。何乔远虽未注明“宋志”全称，但应是指南宋淳祐年间刘颖修、戴溪纂《清源志》，该书共7卷，至明代尚存，后佚。

③ 赵汝适著，杨博文校释：《诸蕃志校释》卷上《毗舍耶》，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149页。

④ “平湖”、“毗舍耶”之名最早见于乾道年间“毗舍耶入寇泉州事”相关记载。“平湖”即澎湖列岛，“毗舍耶”为泉州地区对海外蛮族俗称，一般认为位于今台湾岛南部或菲律宾中部（周运中：《正说台湾古史》，第128—135页）。

⑤ 郑藻为两宋之际开封人，宋徽宗显肃郑皇后兄子，后随宋室南迁杭州，累官至保信军节度使，封荣国公，加太尉，卒谥端靖，为南宋政局中枢人物，著有《绍兴奏议》《乾淳纪事》《行都杂录》等。《乾淳纪事》应成书于淳熙九年（1182）郑藻去世之前，原书今已不存，亦未见存目。郑藻后人郑若曾（号开阳）以《郑端靖公纪事附录》形式，将《乾淳纪事》有关“琉球国”记事编入《琉球图说》（《郑开阳杂著》卷7《琉球图说》，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84册，第618—619页）。

⑥ 真德秀：《西山文集》卷8《申枢密院措置沿海事宜状》，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74册，第129页。引文“置寨于此”指“永宁寨”，位于今泉州市石狮市永宁镇。

⑦ 赵汝适著，杨博文校释：《诸蕃志校释》卷上《流求国》，第147页。

⑧ 何乔远：《闽书》卷7《方域志·澎湖屿》，第179页。

从与澎湖“烟火相望”记载不难推知，泉州地方文献所记“流求”主要指台湾岛南部。泉州地区对“流求”位置和形象记述的变化，表明两宋时期泉州人民在开发、管辖澎湖列岛时，同台湾岛交往逐渐增多，对台湾岛认知正不断深化。

（四）福州：“流求”指向台湾岛北部

除泉州外，两宋时期联系福州与台湾岛北部的“汉番交易”或“岛际贸易”逐渐展开，两地交流增多。同时，自福州出海，经台湾岛北部、琉球群岛，达日本九州西南部的航路逐渐成熟。出土于台湾岛北部、琉球群岛、九州岛的宋代陶瓷器印证了该航路的发展历程。^①在此过程中，福州文献常以“流求”记述对台湾岛的认知。

如南宋绍兴年间，陆游任福州宁德县主簿期间泛海出游，写下《航海》描写大海的波澜壮阔。乾道八年（1172），陆游在蜀中任职期间，以“常忆航巨海，银山卷涛头。一日新雨霁，微茫见流求”追忆在福州航行出海时的情景。下有自注曰：“在福州泛海东望，见流求国。”嘉泰三年（1203）陆游致仕归乡后，又作《感昔》五首回忆昔年种种，其一云：“行年三十忆南游，稳驾沧溟万斛舟。常记早秋雷雨霁，柁师指点说流求。”^②成书于淳熙九年的《三山志》是现存最早福州地方志，卷6《海道》称“昭灵庙下，光风霁日，穷目力而东，有碧拳然，乃琉球国也”。^③嘉泰二年进士刘镇在航海游历浮膺山后作诗：“马头过了又驴头，何处飞来海上洲。绝顶试穷千里目，烟波深处是琉球。”^④

除航海所见外，南宋以后，“登鼓山可望流求”的认知在福州地区形成。如宋末元初程钜夫以“眼底流求弹丸耳，楼船曾见汉家军”想象游历鼓山时的情景。^⑤元人吴海、王礼等以“东南弥望，浩荡不可极，远至于琉球之国，近而梅花、南交诸岛，咸在五步之内”、“纵观鼓山禅寺，登崩劣（劣）峰，坐天风海涛亭上，睨沧

① 三上次男：《冲绳出土的中世纪中国瓷器》，郑国珍译，黄波校，《海交史研究》1988年第2期；高宫広衛：「开元通宝と按司の出現」、『南島文化』第19号、1997年、第1頁；王淑津、刘益昌：《大坵口遗址出土十二至十四世纪中国陶瓷》，《福建文博》2010年第1期。

② 《剑南诗稿》卷1《航海》、卷8《步出万里桥门至江上》、卷59《感昔》，《陆游集》，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11、208、1422页。

③ 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6《地理类六·海道》，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84册，第163页。

④ 刘镇：《浮膺山》，曾唯辑，张如元、吴佐仁校补：《东瓯诗存》，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第62页。浮膺山位于今福建宁德霞浦东南浮膺岛，马头、驴头为宋元福建海上航路岛屿或山名，均在今福建省宁德市境内。

⑤ 程钜夫：《雪楼集》卷26《寅夫惠教游鼓山四诗，细读如在崩巖，杖屨间想像，追和用坚重游之约四首（其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02册，第391页。

溟如铺白云，琉球黝其一发，此身宛在天上”，记录其登顶鼓山时的见闻。^①明嘉靖年间，册封使陈侃依据出使琉球时的航海经历，对福州地区“霁日登鼓山，可望琉球”的认知进行考证，认为所望之地，是在明朝被称为“小琉球”的台湾岛北部。^②以上史料说明两宋时期福州沿海对台湾岛已有相当清晰的地方知识。

唐宋时期，“流求”指向的演变轨迹与中国海外交通的发展历程基本契合。唐时，广州是中国最大的海外贸易中心，“流求”在唐代多被想象为广州海外贸易之国。唐中后期，明州通往日本的航路开始发展，“流求”逐渐被用以指代中日航路的所经之地。入宋后，福建地区的海岛开发和海外贸易空前发展，“流求”指向逐渐由虚趋实，更加具体，在泉州地区多指向澎湖相对的台湾岛南部，在福州地区多指向隔海相望的台湾岛北部。

层累形成于沿海各地的“流求”记录，清晰展现了唐宋时期中国东海疆域演进的历史进程。这一时期，在官方、士人、海商、海民等不同阶层共同参与下，中国民间航海群体已进入琉球群岛，并在当地开展贸易；福建滨海之民同台湾岛交往增多，福建士人从南北两个方向书写台湾岛，深化对台湾岛的认识；泉州人民积极开拓海岛，泉州地方政府已实现对澎湖列岛的有效管辖。

三、元明清时期“流求”指向的统一

元明时期是中国官方强化东海管治、确立东海疆域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官方海洋经略成为中国东海疆域形成的主导力量。在积极海洋政策的推动下，元明官方先后实现对台湾岛的行政管辖和对琉球海域的常态化管控，并逐步统一对“流求”指涉区域的认知。在长期航海实践中，中国的东海认知不断发展深化，东海疆域格局也随之确立，并在清朝进一步得到巩固。

（一）经略“瑠求”与元朝对台湾行政管辖的建立

元代泉州是当时中国海外贸易的中心。泉州地区的海外认知被元朝官方采信，编入正史。如元修《宋史》对“流求”位置记为，“流求国在泉州之东，有海岛曰澎湖，烟火相望”，完全以泉州地区的“流求”认知为中心。《宋史》对“流求”风俗、山川、物产等记述虽依然直接抄录《隋书·流求传》，但又新增“流求旁有毗

① 吴海：《闻过斋集》卷3《游鼓山记》，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17册，第184页；王礼：《麟原文集·后集》卷7《龙泉县宝福院记》，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20册，第518页。

② 陈侃：《使琉球录》，黄润华、薛英编：《国家图书馆藏琉球资料汇编（上）》，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第68页。

舍耶”记述，加入南宋时期“毗舍耶入寇泉州”史事。^①两宋时期形成于泉州地区的地方海洋认知，在元代已正式转化为官方层面的海洋知识。

受泉州“流求”认知的影响，元代官方将“瑠求”指涉区域定为与澎湖“烟火相望”的台湾岛南部，并尝试将其收附。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1291）九月，元廷有征“瑠求”动议，海船副万户杨祥请以六千军队前往招降，不听命则征伐之。“熟知海道利病”的福建书生吴志斗建言“若欲收附，且就澎湖发船往谕，相水势地利，然后兴兵未晚也”。元廷最终采纳吴志斗建议，决定征伐前先遣使诏谕。从元朝廷议可知，此次诏谕以“澎湖”为基地，所欲诏谕之“瑠求”便是台湾岛南部。使团经历半年准备，于至元二十九年三月二十九日自澎湖出航，进赴台湾岛，当日望见海中正东有高山，使团进至山脚，遣军官刘闰率小船十一艘、军士二百余人登岸。因言语不通，使团同岸上居民发生小规模战斗后撤回，四月二日返回澎湖。^②

此次收附行动虽未达到预期，但元朝并未停止对台湾岛的管治实践。元贞三年（1297），元朝以“泉州与瑠求相近，或招或取，易得其情”，“改福建省为福建平海等处行中书省，徙治泉州”。平章政事高兴上言“今立省泉州，距瑠求为近，可伺其消息，或宜招宜伐，不必它调兵力”，“请就近试之”。同年九月，高兴遣省都镇抚张浩、福州新军万户张进赴“瑠求国”，俘获百余人。次年正月，元廷恩准所俘“瑠求人”，“归谕其国，使之效顺”。^③大约同时，因泉州移居澎湖等地居民增多，“编户甚蕃”，元廷正式在澎湖设立巡检司，由泉州府同安县兼辖。澎湖巡检司的设立，完善了元朝在澎湖列岛的行政机构，实现了中央政府对台湾岛的行政管辖。^④

随着元代海外交通的兴盛，元人对台湾岛的认知逐渐完善。至顺元年（1330）、惠宗至元二年（1336）士人汪大渊曾两次自泉州搭乘商船，游历东西洋，并于至正

① 《宋史》卷491《外国七·流求国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4127页。

② 《元史》卷210《外夷三·瑠求》，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4667—4668页；赵孟頫：《送吴礼部奉旨诣澎湖》，《赵孟頫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66页；张之翰：《西岩集》卷3《送吴泉州使琉球》，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04册，第377—378页。

③ 《元史》卷210《外夷三·瑠求》，第4667—4668页；卷19《成宗纪》，第408—409、414、416—417页。

④ 对于元代澎湖巡检司设置的具体时间，学界多有讨论。汪大渊《岛夷志略》称“至元间立巡检司”，但元代“至元”年号有2个，一为元世祖至元年间（1264—1294），一为元惠宗至元年间（1335—1340）。清代修台湾史志时多认为设于元末，当代学者多认为设于元世祖至元年间。汪大渊原著，苏继庠校释：《岛夷志略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3—16页；张海鹏、陶文钊主编：《台湾史稿》，第9—10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台湾问题与新时代中国统一事业》（台湾问题白皮书），第3页。

九年（1349）根据其航海经历撰成《岛夷志略》。《岛夷志略》开篇为“澎湖”，次篇为“琉球”，其后为“三岛”。汪氏对“琉球”位置记为“自澎湖望之甚近”，与泉州地方文献相同，知其所记“琉球”为台湾岛南部。^①《岛夷志略》有关“琉球”山川、风俗、物产等记事不再抄录《隋书·流求传》，所记基本契合今台湾岛南部实际状况，说明元人对台湾岛的认识，正逐渐摆脱《隋书》等旧籍影响。依据实践考察形成的实录性著述，成为元代认知台湾岛的重要知识来源。

（二）羁縻“琉球”与明朝对东海常态化管控的确立

与元朝将“流求”指涉区域定为台湾岛不同，明朝将“流求”位置定在琉球群岛，较元朝有重大转变。对此，学界多将其归于使者杨载矫诏冒功、中山王冒名顶替等偶然因素。^②但从海洋发展史看，这一认知转变实为历史必然。

琉球群岛是位于中日之间的弧形岛链，元末明初在东亚海域的战略地位逐渐凸显。如前所述，唐宋时期，往来于中日之间的海商、僧侣便将航海所经琉球群岛称为“流球”。元末明初，受江浙地区和九州岛北部战乱影响，由明州出洋、经东海、抵九州岛北部的航路变得不安全，自福州出海、经台湾岛北部、琉球群岛、抵达九州西南部的航路，则因相对安全被更加频繁使用。^③琉球群岛在东亚海域的交通地位变得更加重要。同时期，倭寇开始流窜东亚，威胁中国安全，琉球群岛时常沦为倭寇入侵中国的经路及转卖被掳民的据点。^④

元廷对倭患已有所警觉。^⑤明朝建立后，因倭患有增无减，除强化海防外，还试图以外交手段解决倭寇问题。洪武二年（1369）及三年，明朝接连派遣杨载、赵秩

① 汪大渊著，苏继庠校释：《岛夷志略校释》，第16—17页。书中有“余登此山，则观海潮之消长，夜半则望暘谷之日出，红光烛天，山顶为之俱明”的表述，可见其所记多为亲历。

② 和田清：「琉球・台湾の名称に就いて」、『東洋学報』第14卷第4号、1924年、第558—581页；徐晓望：《台湾：流求之名的失落——关于琉球与台湾历史的一种假说》，陈小冲主编：《台湾历史上的移民与社会研究》，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第15页；张崇根：《万国津梁：大历史中的琉球》，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5年，第20页。

③ 榎本涉：「元末内乱期の日元交通」、『東洋学報』第84卷第1号、2002年，第15—17页。

④ 田中健夫：「倭寇と東アジア通交圏」、朝尾直弘ほか編：『日本の社会史』第1卷、東京：岩波書店、1987年、第159页。

⑤ 元朝末年，闽浙地区的海防官员时常因追捕倭寇而到达“琉球大洋”。如元朝惠宗至元六年浙东道宣慰都元帅完者都在浙东督办海防时，“戒严海上。遇渠魁周麻千等于韭山之南，大纵追逐。亲饲舳卒饭，使破浪疾进，几至舟覆身溺者屡。直抵流求国界及之，遂全获”（程端礼：《畏斋集》卷6《故中奉大夫浙东道宣慰都元帅兼蕪县翼上万户府谿勒哲图公行状》，李修生主编：《全元文》，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25册，第554页）。

等人出使日本，责令“日本国王”管束其民，勿纵民为寇、祸患中国。^①杨载等人使日时，途经福州，并“道经琉球”，亲身认识到琉球群岛在倭寇防御中的战略地位。

洪武四年秋杨载自日本归朝后，旋即于洪武五年正月被朝廷派往琉球群岛，以“琉球国”之名诏谕岛上政权。^②同年十二月，“琉球国”中山王察度接诏后遣弟入明，奉表称臣，明琉宗藩关系由此确立。从背景看，明初诏谕琉球，不仅动机上与两次对日“倭寇外交”密切相关，时间上也与洪武四年底“海禁令”颁布相互配合。^③故曹永和、万明等学者都认为，明朝同琉球建立宗藩关系，实有“羁縻琉球，以防倭寇”的战略意图。^④

明琉宗藩关系建立后，明朝逐步强化对琉球海域的管控。洪武六年福建都司都指挥张赫“率舟师巡海上，遇倭寇，追及于琉球大洋中，杀戮甚众，获其弓刀已还”。^⑤七年八月，靖海侯吴祯“总江阴四卫舟师出捕倭，至琉球大洋，获其兵船，献俘京师”。^⑥同年十二月，明朝遣刑部侍郎李浩以“市马”为名前往琉球，在琉球驻守1年有余，收集倭寇情报。^⑦洪武十三年，明朝断绝同日本的交往后，继续强化对琉球的支持。十五年二月，遣尚佩监奉御路谦以护送琉球使者归国为名前往琉球考察。十六年再遣内使监丞梁民同路谦前往琉球，诏谕琉球三王，赐中山王镀金银印，完成对琉球首次册封。十八年又相继赐印于山南王、山北王，实现对琉球的三王并封。^⑧此后，明朝又采取“朝贡不时”、“下赐海船”、

① 《明太祖实录》卷39，洪武二年二月辛未，台北：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1962年，第785页；卷50，洪武三年三月，第987—988页。

② 杨载出使日本、琉球的相关记载，参见郑若曾：《琉球图说》，康熙三十七年（1698）郑定远刻本，黄润华、薛英编：《国家图书馆藏琉球资料汇编（上）》，第1110页；高岱：《鸿猷录》卷6，《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济南：齐鲁书社，1996年，史部，第19册，第76页；胡翰：《胡仲子集》卷5《赠杨载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29册，第58页；《明太祖实录》卷71，洪武五年正月甲子，第1317页。

③ 《明太祖实录》卷77，洪武五年十二月壬寅，第1416—1417页；卷70，洪武四年十二月丙戌，第1300页。

④ 万明：《明代历史叙事中的中琉关系与钓鱼岛》，《历史研究》2016年第3期。

⑤ 《明太祖实录》卷203，洪武二十三年八月甲子，第3042—3043页。

⑥ 《明史》卷131《吴祯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841页。

⑦ 《明太祖实录》卷95，洪武七年十二月乙卯，第1645—1646页；卷105，洪武九年四月甲申，第1754—1755页。有关李浩出使琉球目的讨论参见平田守：「琉明関係における琉球の馬」、『南島史学』第28号、1986年；岡本弘道：「明朝における朝貢國琉球の位置附けとその變化」、『東洋史研究』第57卷第4号、1999年；李健：《“联动”与“调控”：洪武七年李浩往琉球“市马”考述》，《外国问题研究》2017年第4期。

⑧ 《明太祖实录》卷142，洪武十五年二月乙丑，第2236页；卷151，洪武十六年正月丁未，第2375—2376页；卷158，洪武十六年十一月甲申，第2446页；卷170，洪武十八年正月丁卯，第2581—2582页。

“下赐闽人三十六姓”等措施支持琉球发展，使琉球迅速崛起为东亚海域的“万国津梁”，担负起为明朝“作屏东藩”、“作镇海邦”的重任。^①有明一代，琉球群岛不仅没有成为倭寇巢穴，还多次参与倭寇剿捕，在明王朝国家安全战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②

随着明琉关系的发展，明朝逐步完善了对琉球群岛的认知。嘉靖年间，册封使陈侃出使琉球时，对琉球王国的政治组织、社会风俗、山川地理等进行详细考察，并与《隋书》《通典》《大明一统志》等史籍中的“流求”记录进行对比。陈侃发现前代所记“流求”同琉球群岛实际情况多有不同，故在所撰《使琉球录》中专设《群书质异》一章，结合自己在琉球的亲历见闻，对诸书中的“流求”记录进行系统考订，并呈报史馆，以备史官采择或后使参阅。^③

陈侃以后，撰写“使录”成为明清两朝历代琉球册封使的传统，由册封使依据实地考察而撰成“使琉球录”，构建起完备的琉球知识体系，不仅是中国认知琉球的基础资料，也深刻影响了琉球王国的史书修撰、认同构建及江户时代日本的琉球认知。^④

（三）“黑水为界”与古代中国东海疆域的形成

明朝在同琉球的长期航海交往中，正式明确了东海疆域范围。嘉靖十三年（1534），陈侃在呈奏朝廷的出使报告中称“十一日夕，见古米山乃属琉球者”。^⑤嘉靖四十一年，册封使郭汝霖称“闰五月初一日，过钓鱼屿。初三日，至赤屿焉。赤屿者，界琉球地方山也。再一日之风，即可望古米山矣”。^⑥嘉靖年间，时任明工部尚书、太子太傅的雷礼亦在其诗作中称“水环赤屿尽闽疆”。^⑦可见至晚在明嘉靖年间，将钓鱼岛、赤屿及其附近海域视为福建海上疆域，已成为明代官员的普

① 永乐二年（1404）正月，明成祖在颁赐给琉球国世子武宁的册封诏书中称“故琉球国中山王察度，受命皇考太祖高皇帝，作屏东藩，克修臣节”，并要求世子武宁在即位后继续“忠以事上，仁以抚下，克循兹道，作镇海邦”（《明太宗实录》卷28，永乐二年二月壬辰，第510页），概括了明初对琉球的战略定位。

② 真荣平房昭：「明朝の海域政策と琉球——海禁・倭寇論を中心に」、『琉球海域史論（上）』、宜野湾：榕樹書林、2020年、第339—360頁。

③ 陈侃：《使琉球录》，黄润华、薛英编：《国家图书馆藏琉球资料汇编（上）》，第53—96页。

④ 横山学：『琉球国使節渡来の研究』、東京：吉川弘文館、1987年。

⑤ 陈侃：《使琉球录》，黄润华、薛英编：《国家图书馆藏琉球资料汇编（上）》，第27页。

⑥ 郭汝霖：《使琉球录》，萧崇业：《使琉球录》，周宪文主编：《台湾文献丛刊》第287种《使琉球录三种》，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印，1970年，第74页。

⑦ 雷礼：《公行漳州》，《鐔墟堂摘稿》卷19，《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342册，第456页。

遍认知。

至万历年间，以“黑水沟”为中国东海疆界线的认知正式确立。“黑水沟”是中国东海大陆架的自然延伸处，^①由于此地水深普遍超过1000米，船行至此会明显观察到海水颜色变化，故中国先民多以“由沧水入黑水”记录其航行至此的体验，“黑水沟”由此得名。

万历七年（1579），册封使谢杰引闽中父老之言，以“去由沧水入黑水，归由黑水入沧水”，记述了福建民间对中琉海上分界的认知。万历三十四年，使臣夏子阳在去程时以“连日所过水皆深黑色，宛如浊沟积水，或又如靛色”，生动记述了船过“黑水沟”的体验，在回程中再以“二十九日早，隐隐望见一船；众喜，‘谓有船则去中国不远，且水离黑入沧，必是中国之界’”，将“离黑入沧”视为入中国疆界。^②乾隆二十一年（1756），册封副使周煌在《琉球国志略》中以“（琉球）环岛皆海也，海面西距黑水沟，与闽海界”，明确将“黑水沟”视为福建与琉球的海疆分界。^③雍正三年（1725），琉球在官修国史《中山世谱》中以“三府五州三十五郡”、“三十六岛”明确其所辖疆域范围，其中将“姑米岛”定为西端界岛，与明清两朝对中琉海上疆界的认知一致。^④

上述明清册封使关于中琉海上疆界的历史记录充分说明，明清时期，中国民间长期存在的，以东海大陆架自然延伸处“黑水沟”为闽琉海疆分界的认知正式被官方采纳，并成为中琉两国的共同认知。位于“黑水沟”以西的钓鱼诸岛，至晚在明朝便被纳入福建辖内的海疆版图，中国政府对其拥有无可置疑的领土主权。

琉球国位置被明官方确定为琉球群岛后，时人以“琉球”指称台湾岛的认知依然存在，故明代文献中多以“大琉球”、“小琉球”来区分对琉球群岛和台湾岛的不同认知。如绘制于洪武二十二年的《大明混一图》在东南海域依次绘有“澎湖”、“流求”和“大流求”，其中“流求”为横长形，四周绘有山形，“流求”与陆地间绘有“澎湖”。这种绘制方式与汪大渊《岛夷志略》对台湾岛实地考察后所记载的“地势盘穹，林木合抱。山曰翠麓，曰重曼，曰斧头，曰大崎。其峙山极高峻，自澎湖望之甚近”极为契合，表明宋元时期的台湾岛知识已被明朝采录，在官方地图中明确绘出。“流求”之外绘有“大流求”，为竖长椭圆形，

① 即“琉球海槽”，日方称“冲绳海槽”。

② 谢杰：《琉球录撮要补遗》、夏子阳：《使琉球录》卷上《使事纪》，周宪文主编：《台湾文献丛刊》第287种《使琉球录三种》，第276、222—223、226页。

③ 周煌：《琉球国志略》卷5《山川》，黄润华、薛英编：《国家图书馆藏琉球资料汇编（中）》，第899页。

④ 「中山世譜」、横山重ほか編：『琉球史料叢書』、第4卷、第9—11頁。

指代明初入贡的琉球国（今琉球群岛），^①《明太祖实录》洪武二十五年条以“琉球国民才孤那等二十八人……遇大风飘至小琉球界”明确区分琉球群岛（琉球）和台湾岛（小琉球），^②表明明朝官方对台湾岛、琉球群岛位置关系已有较为清晰的认知。

此后，明朝官私著述多以“大、小琉球”分别记录琉球群岛和台湾岛。16世纪，西方人来航东亚时，同样借用明朝的“大、小琉球”（lequio menor、lequio mayor）等名称记录对琉球群岛及台湾岛的认知。^③随着明人对台湾岛的认知逐步完善，“东番”、“鸡笼”、“台湾”等名称相继出现，逐渐取代“小琉球”成为指涉台湾岛的主要名称。

（四）“文武协同”与古代中国东海疆域的巩固

明清之际，西班牙、荷兰等国殖民者纷纷侵扰中国东海海疆，明清王朝积极应对，文武协同，巩固了对东海疆域的统治。

万历三十二年，荷兰殖民者谋占澎湖列岛，明朝甚为重视，于天启四年（1624）逼退荷兰，收复澎湖。同年，荷兰在台湾南部建立侵略据点，并于崇祯十五年（1642）独占台湾。顺治十八年（1661），郑成功率军驱逐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康熙二十二年，清廷命施琅率军统一台湾，巩固东海疆域，实现国家统一。统一台湾后，清廷完善治理台湾的军政体制，积极发展台湾的经济、贸易，在台推行儒学教育和科举制度，逐步开发台湾，使台湾地区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方面基本实现与大陆的一体化。^④

在巩固对台统治的同时，清朝进一步强化了对钓鱼诸岛的管辖。康熙六十一年，黄叔瓚作为首任巡台御史入台。黄叔瓚抵台后巡行各地，考察攻守险隘、海道风信，搜采旧籍记载，参以亲身见闻，撰成《台海使槎录》，内有清代关于钓鱼岛的较早官方记录：“山后大洋，北有山名钓鱼台，可泊大船十余。”^⑤表明在清代赴

① 《大明混一图》原件收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复本展出于中国航海博物馆，参见曹婉如等编：《中国古代地图集（明代）》图1《大明混一图》，北京：文物出版社，1995年，图版说明第1页；刘若芳、汪前进：《〈大明混一图〉绘制时间再探讨》，中国明史学会编：《明史研究》第10辑，合肥：黄山书社，2007年，第329—355页；杨雨蕾、郑晨：《多元的认识：韩国古輿图中的琉球形象》，《海交史研究》2018年第2期。

② 《明太祖实录》卷217，洪武二十五年五月己丑，第3197页。

③ 中村拓：『鎖國前に南蠻人の作れる日本地図（3）』、東京：東洋文庫、1967年。

④ 邢广程、李大龙主编：《清代国家统一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3年，第224、1123—1227页。

⑤ 黄叔瓚：《台海使槎录》卷2《赤嵌笔谈》，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51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8年，第34页。

台官员的意识中,钓鱼诸岛已属中央政府的行政管辖范围。^①

在推动台湾与大陆一体化的进程中,清王朝强化了对琉球的管控。顺治四年,清廷占领福建后,便携滞留福建的琉球贡使入京朝贺。顺治皇帝对琉球使者“格外优恤”,积极确立同琉球的宗藩关系。^②康熙皇帝即位后,更加重视对琉经略,积极推动册封使入琉册封,完善对琉册封制度,优化册封使选拔机制,优待琉球来华使团,扩大琉球来华留学生规模,进一步巩固中琉宗藩关系。^③

康熙五十七年,清廷派遣测量官平安、丰盛额等,随海宝、徐葆光使团前往琉球,绘制琉球地图,深化东海认知。使臣、测量官经过细致查访、勘测及同琉球官员、士人的反复商议、审定,完成《琉球星野图》《琉球三十六岛图》《琉球地图》等东海舆图,深化对琉球地理及东海岛屿构成的认知。^④这些舆图也是历史上首次由中琉双方共同认定的疆域图,明确记载了钓鱼诸岛属中国疆域,“姑米山”(今久米岛)为中琉界山,“奇界岛”(今喜界岛)为琉球海疆北界的疆域格局。^⑤《中山传信录》刊布后,在日本、英国、法国等广为传播,影响深远,其所确立的东海疆界,成为各国标绘东亚海域、琉球群岛的重要参照,形成了当时的国际共识。^⑥

综上,元明清时期,官方海洋经略成为古代中国东海疆域形成和巩固的主导力量。元朝积极拓展海疆,将“瑠求”确定为台湾岛南部,通过设立澎湖巡检司,实现对台湾岛的行政管辖。明朝重点强化海防,将“琉球”确定为琉球群岛,通过帮助琉球发展,实现对琉球海域的常态化管控。此后,“流求”指向在明官方主导下逐渐统一为今琉球群岛。清朝推动国家统一,基本实现台湾与大陆的一体化进程,强化中琉宗藩关系,巩固东海疆域。在中琉两国的长期航海实践中,古代中国确立了以澎湖列岛、台湾岛、钓鱼诸岛为直接统治疆域,以“黑水沟”为闽琉海疆分界,以琉球群岛为属国自治疆域,以“奇界岛”为琉日海疆分界的东海疆域格局,并成为当时社会的普遍共识。

① 郑海麟:《〈台海使槎录〉所记“钓鱼台”“崇爻之薛波兰”考》,《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4月24日,第A05版。

② 邢广程、李大龙主编:《清代国家统一史》,第1080—1081页。

③ 赖正维:《康熙时期的中琉关系》,北京:海洋出版社,2004年。

④ 徐葆光:《中山传信录》卷4,黄润华、薛英编:《国家图书馆藏琉球资料汇编(中)》,第303—362页。

⑤ 吴巍巍、张永钦:《康熙时期中国天文生测绘琉球地图考——兼论钓鱼岛主权归属问题》,上海中国航海博物馆主办:《国家航海》第9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04—116页。

⑥ 如江户时代日本政治学者林子平在其所绘《三国通览图说·琉球三省并三十六岛图》中,明确将钓鱼诸岛标绘在中国海疆内,将“奇界”(喜界岛)标为琉日海疆分界,属琉球疆域最北界。

结 语

从知识社会史和海洋发展史视角，系统梳理隋明之间层累形成于各地域、各阶层的“流求”记录，不仅为解决延续百余年的“流求”位置论争提供新思路，也清晰展现了古代中国东海疆域形成、发展及演进的历史轨迹。

隋代是古代中国东海疆域形成的关键时期。隋统一后，前代积累的海洋经验为隋朝官方的海洋经略奠定了基础。隋炀帝时期朱宽等人的海外探索，是中国官方对东海等环中国海岛屿的一次全方位探索，也是中国尝试收附台湾岛等东海岛屿的重要史证。唐初修隋史时，官方正式以“流求”命名东海列岛，将东海纳入国家叙事。

唐宋时期是古代中国东海疆域发展的重要阶段。这一时期，沿海各地的海外交通渐次兴盛，“流求”意象广为流传，指涉区域不断扩大，一方面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另一方面逐渐由虚趋实、具体指向台湾岛。在官方、士人、海商、海民等不同阶层的共同参与下，古代中国对东海列岛展开了全方位经营、开发，并实现了对澎湖列岛的有效管治。

元明时期古代中国的东海疆域格局正式确立。元明两朝根据东海形势变化，分别强化了对台湾岛的管治和琉球群岛的管控。元官方将“瑠求”确定为台湾岛南部，实现对台湾岛的行政管辖。明官方将“琉球”确定为琉球群岛，通过帮助琉球发展，实现对东海的常态化管控。此后，“流求”指向在明官方主导下逐渐统一为今琉球群岛，古代中国的东海疆域格局在中琉两国的长期航海实践中正式确立，并在清朝国家统一进程中逐渐巩固。

古代中国的东海疆域是在中国社会各阶层对东海探索、经营、开发、管治的长期历史实践中形成的，不仅符合中国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也符合疆域形成的一般历史规律。民间航海活动、士人海洋书写、官方海洋经略，是中国海疆形成的三大历史动力；浩瀚史籍中丰富的海洋文献，是中国先民开拓海疆的历史见证。个体经验、地方记忆、国家叙事间的互证互补，构成中国在东海等海域历史性权利无可辩驳的完整证据链。

〔作者陈刚，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暨东海问题研究中心博士后。北京 100007〕

（责任编辑：管俊玮）

the power of drafting suggested rescripts for the emperor, which was known as piaoni (票拟), the chief eunuchs were given the right to note down remarks in red color, known as pihong (批红), on the incoming memorials, and the emperor ruled by the combination of the two approaches, which evolved into the “new ancestral system”. This not only changed the power structure and government operation of imperial politics in the early Ming Dynasty, but also affected the representation of imperial power in the middle and late Ming Dynasty. Besides, the political status of the Grand Secretariat was promoted and institutional space was created for eunuchs to participate in the central decision-making process. The disconnection between the “new ancestral system” and the system set up by Hongwu Emperor in the early Ming Dynasty led to the widespread and lasting criticism of the monarchical power, the Grand Secretariat and eunuchs.

A Review of the History of the East China Sea Territory’s Formation in Ancient China through Analysis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Liuqiu” Direction Chen Gang (119)

The image of an island country in the East China Sea named “Liuqiu” contained in the *SuiShu* is actually a composite of many Sui Dynasty overseas explorations with different natures, directions, and destinations, composed in the early Tang Dynasty, so its specific direction is not clear. From the Tang Dynasty to the Song Dynasty, various groups, including officials, scholars, maritime merchants and seafarers, participat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ast China Sea, and sea routes were continuously expanded. Different coastal areas formed their own images of “Liuqiu”. During this process, the region referred to as “Liuqiu” transitioned from the imagination to reality, and gradually pointing to Taiwan Island. During the Yuan and Ming Dynasties, Chinese officials strengthened their management of Taiwan Island and the “Liuqiu”/Ryukyu Islands in response to the changing situation in the East China Sea, and achieved administrative jurisdiction over Taiwan Island and a regular state of control over the Ryukyu waters, with “Liuqiu” coming to refer to the present day Ryukyu Islands under their influence.